



由省委宣传部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，贵州画院(贵州美术馆)承办的2024—2025多彩贵州文化遗产主题青年美术展将于1月11日结束，该展持续展出近1个月期间，贵州美术馆日均接待观众近千人次，较同期有明显增长。无论是出于对多彩贵州的好奇与向往，还是对美术艺术的热爱，众多观众从各地汇聚而来，在贵州美术馆感受文化遗产从传统走向创新的活力，体会画作中传递的民族文化与时代变迁。

2024—2025多彩贵州文化遗产主题青年美术展现场。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贾智 摄

青春绘文脉 共续薪火长

2024—2025 多彩贵州文化遗产主题青年美术展侧记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

艺术化绘就文化遗产地图

本次展览是多彩贵州“四大文化工程”年度重点工作之一，首次以美术作品的形式，集中展现贵州部分红色旧址，世界级、国家级文化遗产，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古镇等文化资源，设置了“凝注烽火荣光，承载革命记忆”“世界文化遗珍，中华文脉赓续”“岁月流淌非遗，文明活态传承”“时光淬炼风华，名城古村新生”4个板块。

据了解，展览于2025年3月启动征稿，吸引全国289位青年艺术家参与投稿，最终46件作品入选，涵盖中国画、油画、版画等多个艺术门类。同时，展览特邀岳黔山、何红舟等18位省内外知名艺术家进行主题创作，形成“公开征稿+名家特邀”双轨并行的展览格局，共展出81件精品力作。

贵州画院院长、贵州美术馆馆长潘闻丞表示：“这些作品既生动展现了贵州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，也充分彰显了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活力与文化担当。”在潘闻丞看来，此次展览具有“在地性”“年轻化”“新主体性”“互动性”4个方面的特征。

首先是“在地性”。潘闻丞认为，展现贵州丰富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资源，不是简单的符号借用，而是通过当代艺术语言，转化为具有反思与对话能力的创造性表达。让贵州本身成为一种创作方法和观念。

其次是“年轻化”。潘闻丞说：“展览提供了崭新的青年视角。年轻创作者们以个体经验介入，批判性地审视并重新诠释文化符号。他们关注生态、城乡关系等普遍议题，打破外界对贵州单一的想象，呈现出多层次、动态的文化图景。”

此外是“新主体性”。潘闻丞谈到，“展览集体呈现了一种建构本土文化话语的尝试。艺术家通过多种媒介，将地方性元素转化为当代艺术表达。这推动贵州从‘被描述的对象’向‘自我阐释的主体’转变，重塑了本土文化的当代价值。”

最后是“互动性”。“这场展览超越了一次性的艺术活动，更扮演了生态触发者的角色。它为青年艺术家提供了宝贵的展示与对话平台，促进了本土与外界艺术力量的互动。同时带动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，有望激发持续性的创作、讨论与合作，为本地艺术生态的良性发展注入活力。”潘闻丞总结道。

青春笔触展现传承活力

前来观展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王平认为，美术是讲述时代与历史的重要语言，本次展览以画笔描绘贵州历史、展现黔地风貌，为观众搭建了感知贵州人文自然与历史底蕴的重要平台。“展览涵盖多种艺术门类，艺术家们以丰富的艺术语言多视角呈现贵州文化遗产的多样性；青年画家的广泛参与，既为创作注入活力，也让更多年轻人走近文化遗产、传承文化根脉。”王平说。

在展览中，青年艺术家以新锐视角实现对传统表现形式的突破。油画《屯堡遗风》摒弃常规视角，采用俯视构图展现屯堡建筑群的整体格局，将历史信息转化为当代艺术表达；《安顺文庙忆弦歌》以水色分割画面空间，通过老人与青年学生的意象并置，构建出文化传承的隐喻叙事，超越了单纯的景观记录；《酱醋飘香》定格禹贡酱醋酿造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通过主题创作为家乡发声。

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孙逊表示，本次展览征集到的作品面貌多样，较好反映了当前全国美术创作的现状，部分作品不仅体现了画家的艺术水准，更展现出严谨的创作态度，整体效果良好。

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原主席湛宏微作为点评嘉宾，对展览给予高度评价。他认为，本次展览是国内少见的大规模地域文化遗产主题青年创作实践。作品不仅主题契合度高，艺术水准更是亮点突出。中国画在大场景主题创作中实现突破性表达，尤其是多幅难度颇高的大场景写意人物画，成为展览中的亮点。油画与版画则各具艺术特色，充分

展现了当代青年艺术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大胆的创新活力。

作为本次展览的特邀作者，版画家、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建山观展后认为，近年来贵州的年轻艺术创作者进步迅速，在全国各类展览中屡获佳绩。本次展览中许多作者来自高校，包括年轻教师和在校学生，他们通过主题性创作得到锻炼，为贵州画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与蓬勃生气。

艺术与公众的双向奔赴

1月3日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展厅现场人气爆棚。一大早，美术教师李芳带着学生从贵阳市花溪区赶来，开展研学观摩活动。她说：“我们希望能培养孩子们发现美的眼睛，让他们从艺术中读懂多彩贵州，在心中种下文化与艺术的种子。”

观众罗怡涵在展厅内不时驻足欣赏，“这场展览让我十分震撼，真切感受到艺术与生活的魅力。艺术就在我们身边，比如套色木刻作品《湛蓝的苗艺》，构图新颖，将蕴含民族历史记忆、图腾崇拜的蜡染表现得鲜活生动，非常精美。”罗怡涵说。

展览开幕后，主办方推出线上虚拟展厅、开设“文化遗产创作故事”专栏解读艺术家的创作心路、组织开展公共教育体验活动，并邀请国际山地旅游联盟代表等嘉宾现场解读展览亮点与展品内容，帮助观众理解画作的技法与构图，探索作品背后的艺术之美，实现美术教育线上线下频频共振。

此外，“2024—2025多彩贵州文化遗产主题青年美术展公教体验活动——感知指尖非遗·赏黔彩纷呈”也在展览期间同步举行，通过艺术展演、专家分享与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，为这场展览增添了别样的参观体验。

省内外美术家纷纷指出，从省级层面围绕文化遗产主题组织开展大规模、主题性的美术创作实践，这不仅为贵州美术史上的首次，在全国也属首例。观众普遍认为，此次展览水平高，是一场精彩的艺术盛宴。

展览是一次新的起点。潘闻丞表示，本次展览有机衔接了美术馆“藏品体系、学术研究、公共美育”三大核心功能。接下来，贵州美术馆将以承办此次展览为契机，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用心、用情、用力打造美术精品。



贵州人与《四川盐法志》

张文建

提起《四川盐法志》，许多人知之甚少。但提起丁宝桢，想必家喻户晓了。的确，《四川盐法志》正是丁宝桢修的志书。要说《四川盐法志》，得从丁宝桢任四川总督，推行盐务改革说起。

丁宝桢（1820—1886），字稚璜，贵州平远（今毕节市织金县）人，光绪二年（1876）九月任四川总督。一到四川就任，丁宝桢就“旁咨博询”“沿途悉心体察”，了解四川情形。此时的四川还不是为人所称道的“富饶之区”，而是财政入不敷出，官员竞相奢靡、盗匪横行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此外，历史上，四川是盐务大省，川盐是云南、贵州、湖北、湖南等省食盐的重要来源，盐税占据四川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。然而，现实却是川盐入滇、入黔中断，盐引堆积成废纸、百姓食盐困难、政府收支难维。

于是，丁宝桢从“川省第一大政”——盐务着手整顿。

光绪三年（1877）七月，丁宝桢上书朝廷，提出对川省盐务进行改革——推行黔边盐务官运商销。

所谓官运商销，又称局运商销，即由官府直接经营食盐的采购、转运，仅在销售领域委之商贩。其具体举措是：在四川泸州设立办理黔边盐务总局，在产盐的富顺、犍为、射洪三厂分别设立购盐分局，在綦江、涪州、合江、永宁四岸及近边之各厅州县分别设立售盐分局，厂局负责买盐运给岸局，岸局接收之后卖给商人，最后由商人卖给各地的百姓。至于官运商销的具体事务，则由黔边盐务总局全权负责。

在实行官运商销的过程中，丁宝桢还通过制定裁减浮费、清理积引、兼办计岸、引归局配、实给船价、酌给奖叙等举措，以保证改革措施的顺利施行。在《筹办黔边盐务官运商销折》中，丁宝桢提出，若实行官运官销，则“费用过巨，稽查难周”；实行官商并运，则“在途则多夹带影射，在岸则虚糜断把持”，唯有官运商销，才能“以简御繁，诸弊可期断绝”。

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在总办黔边盐务局、候补道唐炯等人的大力协助之下，丁宝桢实行的官运商销短期内就取得成效。据《丁文诚公奏稿》中的《黔边盐务情形片》，从光绪三年（1877）十二月到次年四月底，短短5个月，黔边已销售本年额引四分之三，收各项盐税超过38万两，相比往年“销引已属加倍”“收银亦已增多”，到年底“必可带销积引一万余张”。此外，各大小商灶“踊跃趋公”，并河及沿江船户“添造船只”承担官运、各岸商人“争售官盐”，川黔各岸已有“食盐之喜”，黔边盐务官运商销“似已大臻成效”。

在此背景下，丁宝桢实行的盐务官运商销范围也逐渐扩大，先由黔岸推广至滇岸，再由黔、滇两岸推广至湖北例食川盐的8个州县，累计在4省40多个厅州县推行。据《官运盐务帮本还清余款分别存留备拨折》，到光绪八年（1882）五月，其实施的川省盐务官运商销累计为清政府创收300多万两白银。

在四川盐务改革取得成效的情况下，光绪七年（1881）十二月，丁宝桢上奏提出编纂《四川盐法志》。在《拟纂〈四川盐法志〉片》中，丁宝桢首先指出，各盐务省份均颁有《盐法志》，因此当地“官商灶户，无不奉行维谨，罔敢逾越”。四川省盐务混乱，“骇人听闻”的原因固然是“官、商之敢于贪诈”，更重要的则是“虽有成法可循，究未经定为志乘颁发通行以资准则”。因此，在当今官运商销“纲纪秩然，百弊略净”情况下，“拟为久远遵守之计”，与盐茶道崧蕃、建昌道唐炯等编纂《四川盐法志》，“期为川省日后不易之定则”。

光绪八年（1882）五月，在崧蕃、唐炯等人的大力支持下，《四川盐

法志》编纂成书。于是，丁宝桢上《〈四川盐法志〉成书恭呈御览折》，“缮具黄册”“恭呈御览”。同年，丁宝桢总纂的《四川盐法志》正式刊刻。

关于这部志书的目录编次及缘由，《四川盐法志》收录的一份丁宝桢的奏表有详细说明：“若夫宪典悉遵，圣训饬恤，渥被皇仁；敕书则翼命重申，圣制则天章首焕，特先恭纪用弁于端。泉脉伏地，宜附丽于方州；民食为天，等艰难于稼穡，则以《井厂》次之，而各图说系焉。计边分岸，比飞鸟挽粟之劳；水陆交驰，见雷骈云炉之利，再次以《转运》，而疆域运道各图表系焉。盐入褐书，遂沿流为交子；水衡主利，用分佐度支，又次以《引票》《征榷》，而《配引》《榷额》二表系焉。然而官司主计，治法必有治人，鸢鹭多私，兴利必先剔弊，则《职官》次之，《缉私》又次之。至若入境问禁，邦有常刑，则《禁令》尤宜共守。援古证今，义资考镜，故《纪遗》用以终编。”

翻开天津图书馆馆藏光绪八年（1882）四十卷刻本《四川盐法志》，在“纂辑职名”下，有两位熟悉的贵州人，一位是担任“提调”（负责志书编纂调度督促）的四川分巡建昌兵备道、办理滇黔边计盐务、今授云南布政使臣唐炯，还有一位是担任“采访”（负责采集寻访资料）的四川特用知府华联辉。

唐炯（1829—1909），贵州遵义人，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举人，在丁宝桢推行的官运商销盐务改革中担任黔边盐务总局总办，在盐务改革中起到中坚作用。对此，丁宝桢对这位

贵州老乡也是高度评价，称赞有加，多次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举荐，如“于川黔两省边势民情洞澈无遗，而才气亦足以济事”，“忠正强毅、清操绝人，其公尔忘私”，“心精力果、守洁才明、矢志公忠”。光绪六年（1880）二月十九日，丁宝桢在盐务官运商销大有成效之下，向朝廷上《保举人才堪备任使折》，特意举荐唐炯，说他“秉性刚毅、操守谨严、识见宏远、才气深厚”，实在是“文武兼资、缓急足恃，堪当大任之才。”也是在丁宝桢的大力举荐之下，唐炯从最初的候补道员实任四川建昌兵备道（正四品），再到后来升任云南布政使（从二品），成为一省封疆大吏。

华联辉（1833—1885）也是贵州遵义人。他既是茅台酒的创始人，也是丁宝桢盐务改革中的关键人物。在参加盐务改革以前，华联辉是贵州有名的盐商，深谙盐务和经商之道。当唐炯向丁宝桢推荐华联辉负责盐务官运商销的具体事宜时，丁宝桢“即函致来蜀，与之咨商一切”。在交谈过程中，丁宝桢对华联辉提出的“非专意于恤商便民不为功”“成本甚钜，当可设法。惟口岸甚多，商情必通，而后根基可固”等条大为赞赏，以致后来专门上奏保举，说他“操行正大、识见闳远、才力坚卓、条理精详”“盟心在局，数年不受一毫薪水，尤为近今罕见”，并评价他是四川盐务改革中的最大功臣。

此外，通过查阅资料发现，《四川盐法志》“纂辑职名”下27个人中，贵州人多达11位，占据籍贯可考者一半。这11位贵州人，除了丁宝桢、唐炯、华联辉外，还包括“编辑”罗文彬（贵州贵阳人）、“校定”文天骏（贵州清镇人）、“检校”陈鸿作（贵州贵阳人），以及“采访”阮全龄（贵州息烽人）、于德楷（贵州贵阳人）、华国英（贵州遵义人）、刘藻（贵州贵筑人）、赵廷璜（贵州遵义县人）等。这些人，既是编纂《四川盐法志》的重要参与者，也是丁宝桢四川盐务改革的中坚力量。因此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一部《四川盐法志》，是由众多贵州人参与编修的，而发生在晚清的那场四川盐务官运商销改革，也是由众多贵州人联手参与、推动的。

本版责编：黄蔚 陈曦 姚曼 赵怡 式设计：侯刚



2024—2025多彩贵州文化遗产主题青年美术展吸引众多观众。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贾智 摄